# “忠义”与明代书目著录《水浒传》的历史意义*

温庆新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明代书目著录章回小说《水浒传》时,或归于“野史”“传记”,或入“子杂”类,这与《水浒传》本名《京本忠义传》及其早期刊本系统题署含有“忠义”二字,有很大关系。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较早的一批谈论者是李开先之类的文坛名流,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这种以为《水浒传》是史书的看法并非仅是当时民间的意见,而含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水浒传》早期流传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明代统治者从宣传“忠义”维护统治的需求出发,在都察院刊刻前曾对《水浒传》进行过“致审”。“忠义”思想成为《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这就保证《水浒传》得以有效传播开来。

[关键词]《水浒传》;书目;《京本忠义传》;“忠义”;都察院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9)01—0085—07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19.01.011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ng Yi”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Bibliographic Recorded Shui Hu Zhuan in the Ming Dynasty

WEN Qing-x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bibliographic recorded Shui Hu Zhuan in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attributed to the “Ye Shi”, “Zhuan Ji” or the “Zi Za”. It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its name containing the “Zhong Yi” word. In the Shui Hu Zhuan early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e critics were the social elites. Most of them thought what it said had some basis. As the same as San Guo Yan Yi, it was also spread from the upper class to the bottom of society. Because of the “Zhong Yi” thoughts, it met the needs of the rulers to maintain domination; therefore, it could be successfully spread.

Key words: Shui Hu Zhuan; the bibliographic; Jing Ben Zhong Yi Zhuan; “Zhong Yi”; Du Cha Yuan

自20世纪初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范式起,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张国光、欧阳健、马幼垣等对《水浒传》的版本系统、流传过程有过诸多细致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些共识。有关《水浒传》的传播情形,亦有不少学者展开过专论。在相关研究成果中,学界已注意明代书目著录《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通俗小说的现象,然多以为此系白话小说或通俗章回小说于当时流行的表征,罕有学者论及明季书目著录《水浒传》的历史意义。② 虽有学者注意到明季都察院刊刻《水浒传》的史实,却多拘囿于探讨《水浒传》的版刻系统,反而忽略此类史实背后的官方意志。因此,从明代书目著录《水浒传》切入,结合当时的文治背景与时人评论意见探讨《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或更能切中肯綮。这种视角对深入探讨明中叶以降白话章回小说的传播过程,亦有所帮助。

* [收稿日期]2018—0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综合研究(18CZW008)
[作者简介]温庆新(1987—),男,福建泉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小说史及小说文献。
②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指章回小说《水浒传》,而不是“水浒戏”或者“古本水浒传”。所言《水浒传》,除特别注明外,皆指章回小说《水浒传》。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一 明代书目的《水浒传》著录与《水浒传》本名考辨

明代书目著录《水浒传》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即晁瑮《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所言:"《忠义水浒传》","《水浒传》武定板"。高儒《百川书志》"史部·野史"言:"《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癸辛杂志》中具有百八人混名。"周弘祖《古今书刻》"都察院"言:"《水浒传》。"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传记类"言:"《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这些书目多系私家藏目,成书年代集中于嘉靖年间。

上述诸书目提及《水浒传》时,或称《水浒传》,或称《忠义水浒传》;所言《水浒传》版本,有"武定板",亦有"都察院"刻本。所言《水浒传》性质,或归于"史部",言"子杂"类,而不以"说部"名之。案,《宝文堂书目》系晁瑮清查自家藏书的"账簿"书目,晁氏尚只于书中注明须重新归类之书而未进一步整理归纳,故该书目所载多见一书重出者,如《楚史梼杌》既见于"史"类,又见于"子杂"类,等等。应该说,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与"史"类,并无严格的区分标准,如"子杂"类录《警时新录》自注:"入史类","图志"类收录《大金国志》自注:"此可入史类",也就是说《宝文堂书目》部类划分与作品著录尚未十分严密。从某种意义讲,《宝文堂书目》的"史"类与"子杂"类是可相通的,"传记"系"史类"中的一小类。[1]据此,上述诸书目多将《水浒传》当作一部"史书"。这种现象有何启示意义?或者说,这种著录情形以何标准为据?现试以《水浒传》本名考辨为视角,略以申说。

从《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著录情形可知,明中叶《水浒传》刊刻版本中有题署作"忠义水浒传"者。检视文献记录与今存《水浒传》的明代刊本,大略可确定明代的代表性版本有:

| 版本 | 著录文献或今存情形 |
| --- | --- |
| 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李开先《词谑》著录; | |
|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 | 高儒《百川书志》著录; |
| 都察院刊本水浒传, | 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 |
| 水浒传武定板, | 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 |
| 京本忠义传,今存上海图书馆藏嘉靖年间刊本; | |
| 忠义水浒传,今存原藏郑振铎明嘉靖年间刊本; | |
| 忠义水浒传一百回, | 今存李玄伯藏明刻本; |
|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 今存明容与堂刊本; |
| 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 今存巴黎国家图书馆等藏明刊本; |
|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 今存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 |
|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今存明余氏双峰堂刊本; | |
| 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不分卷,今存明袁无涯刊本;① | |

上述明代刊刻本名《水浒传》以《忠义水浒传》者,数量颇众:不论是冠以"京本""新刊""全像"的刻本或托李贽、钟伯敬等名流的批评本,还是代表官方意志的都察院刊本,皆冠以"忠义"二字。而且,明嘉靖年间的刊本多题为"忠义水浒传",表明"忠义水浒传"是《水浒传》早期刊本系统的统一题署。学界普遍认为,今存最早的《水浒传》刊本,系1957年上海图书馆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刻本——残存第十卷第十七页AB面、第三十六页A面三行及B面全部,此本直接题名"忠义传",不作"水浒传"。结合《水浒传》或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背景看,[5]45-53则"忠义传"当为《水浒传》本名。又,从《水浒传》文本的内证看,第八十一回卷首"入回诗"云:"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也就是说,整理者整合作品时,亦以"忠义"为核心指导思想;从"水浒戏""古本水浒传"到今存《水浒传》的演变过程中,"忠义"一直贯穿始终。如《宣和遗事》就言宋江等人是"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助行忠义,卫护国家"。[5]43据此,现存《水浒传》明刊本的题署与《水浒传》文本所言等内外证,知《水浒传》本名当有"忠义"二字。换句话讲,明代刻书从业者与写作者(或者说整理者),多习惯以《忠义水浒传》名之。

若上述所言不虚,则《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等明代书目据此书普遍的版本题署进行作品著录时,因循题署著录"忠义"二字,并从"忠义"思想的角度将《水浒传》归入"史部"或接近于野史、杂史的"子杂"类,也就有了学理依据。比如,《宝文堂书目》"史"类与"子杂"类可相通,故"子杂"类所录含有一定的"史部"著录价值。又,《百川书志》称"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

① 以上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2],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3],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4]等进行排列。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癸辛杂志》中具有百八人混名”，则高氏认为《水浒传》所言有所本。而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归入“传记类”，并于《稗史汇编·引》中进一步指出：“盖经艺虽陈于列圣，而补葺尤藉夫群儒，此志乘所以继六艺而作也。志乘也者，将以羽翼六艺，而天下后世目之曰正史。正史具美丑、存劝戒备矣。间有格于讳忌、隘于听睹，而正史所不能尽者，则山林薮泽之士复搜缀遗文，别成一家言，而目之曰小说，又所以羽翼正史者也，著述家宁能废之。”强调“史稗一体”。[6]故王圻归于“传记类”，显然基于《水浒传》的史学价值而言。可见，诸书目以为《水浒传》并非全盘虚构而是有所本，则诸氏对《水浒传》所言“忠义”当持肯定的态度。从历代史书的演变过程看，纪传体正史就含有“忠义列传”一类。最早专列者当系《晋书》，《晋书》第五十九“忠义列传”言：“古人有言：‘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信哉斯言也！是知陨节苟合其宜，义夫岂吝其没；捐躯若得其所，烈士不爱其存，故能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徽烈者也。”[7]之后历代正史大多列有“忠义传”，如《宋史》“忠义传”凡九卷，立传者二百七十余人，大多是抗金击辽、舍生取义的“忠义”之士。《晋书》所谓“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史官对“忠义”的这种诠释，与《水浒传》“替天行道”、受“招安”，出征平辽的“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之举，本无二致。《水浒传》第四十二回写宋江遇九天玄女而受天书三卷，言及“天书”法旨，云：“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证撰写者撰写之初已有诸如此类的考量。

据此，明代书目多将《水浒传》归入史书，认为可裨益正史，正是源于对《水浒传》“忠义”主题的肯定。也就是说，明代书目对《水浒传》的认识是基于当时刊刻本上的题署与作品主题两方面因素展开的。

## 二　明人对《水浒传》的普遍认识与《水浒传》的基本定位

那么，是否只是晁瑮、高儒、王圻等明代私人藏书家才认为《水浒传》属于“史书”、所言有所本？这种认识是否带有普遍意义？换句话说，明人对《水浒传》的基本认识是否趋于一致？这就涉及《水浒传》在明代中叶以降的传播情形。

从传播学及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一部作品问世之后紧接着就是流传过程，是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使其价值及意义得以体现。探讨作品的意义只有在其成书并流布、以及在流传过程中的影响范围内进行。新作品成书或流传（借阅、传抄、刻印等）后，就有了信息传播或相关记录，存在被谈论或被引用等情况，这是作品被承认存在的前提。因此，我们探讨《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是以时人对《水浒传》的记录、评论，或者《水浒传》的版刻文献为基点，而不是以“水浒戏”或者“古本水浒传”等为讨论对象的。

较早提及《水浒传》的明季文人评论著述中，有一种比较明显的评判倾向，即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如李开先《词谑》云：“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8]167所谓“《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不仅认可《水浒传》“委曲详尽”的叙述价值，同时强调《水浒传》的“学史之妙”。谈论者除崔铣（曾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外，余四人及李开先皆属“嘉靖八才子”，为当时社会名流。由于《词谑》是现存较早的《水浒传》评论著述，诸氏于嘉靖初年的一起评论，[8]表明《水浒传》流传之初，当时文人们往往将其与正史对比以探讨其价值，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钱希言《戏瑕》（卷一）亦言：“词话每本头上有‘情客’一段，权做个德胜利市头回。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泛韵，脍炙千古，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9]又，莫是龙《笔麈》言：“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焚之可也。”[8]191-195亦以之为“野史”。莫是龙等文虽批评《水浒传》所写“芜秽之谈”与正史不合，反而侧面说明在当时文人心中存在一种径直以史书身份定位《水浒传》的阅读倾向。又，袁宏道在《觞政》“掌故”条言：“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10]又于《听朱生说水浒传》云：“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11]以为与《水浒传》相比，《六经》“非至文”、《史记》“失组练”，颇有将《水浒传》列入儒家“经典”之意，可谓惊世骇俗。也就是说，不论是批评《水浒传》内容不合史书，还是盛赞其“忠义”主题或“发愤著书”的写作思想，如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序》等。这种情况主要见于书商刊刻的托名流的“新刊”“京本”“评林”等刊刻本中。）[8]171-172都要将其与《史记》《宋史》等正史联系比对。这些评论者不仅有当时思想界影响甚大的李贽等，又有文坛名流“嘉靖八才子”，乃至非正统文人的代表袁宏道，涵盖面广。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故托名“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序》所言“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5]169深刻道出明代文人喜以《史记》比附于《水浒传》的阅读现象。换句话讲,以“野史”“传记类”定位《水浒传》者,并非当时目录学家的专利,而是代表着明代文人在《水浒传》刊刻早期的一种接受态度。[5]45-53当时的文人并不是以今人所言“白话小说”“通俗小说”或是“章回小说”加以定位的,而是以“史书”的身份加以接受的,并进一步于“史书”部类下的“野史”“传记”“子杂”“杂传”之中探寻《水浒传》的定位问题。正因如此,当时文人一方面看到《水浒传》的“学史之妙”,另一方面又以考据视角将其与正史比较,从而得出“凭稗之谈”之类的结论。

至于《水浒传》与《宋史》等的关系,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时人批判《水浒传》与史不合,以考据态度评价其所写是否属实,虽涉及时人的虚实观念,却恰巧说明时人以为《水浒传》所言有所本。换句话讲,明代文人将《水浒传》比于“史书”做法的潜在意识,是普遍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真实可信。这是明代文人评论著述中的另一种明显评判倾向。如许自昌《捧腹斋漫录》将《水浒传》与《宋史》对照而读,虽得出“多与史传不合”的结论,[5]191但这种做法本身说明在许氏考据比对之前,其意识是以为《水浒传》有所本的。又如,天海藏《题水浒传叙》言:“昔人谓《春秋》者史外传心之要典,愚则谓此传者,纪外叙事之要览也。岂可曰:此非圣经,此非贤传,而可藐之哉?”[5]192-193所谓“纪外叙事之要览”,亦认可《水浒传》的“纪传”价值。上引诸文献,并不皆出自《水浒传》刊刻序跋,也就排除书贾为牟利而拔高作品价值之嫌。这些评论者既有当时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亦有低层文人、乃至书贾,涵盖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此类意见有着普遍意义,亦有探讨价值。当然,并非所有明人皆认为《水浒传》可信,亦有不少人认为其所写荒诞不经,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言:“《水浒》所撰语稍涉声偶声,辄呕哕不足观,信其伎俩易尽;第述情叙事,针工密致,亦滑稽之雄也。”[5]189。然胡应麟批判重点在于“撰语稍涉声偶声”而非史事不经。

虽然,明代文人有关《水浒传》的认识是多元的,但在《水浒传》早期刊刻与流传中,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史书,大多以为或部分认可《水浒传》是可信的,形成时人在《水浒传》早期传播的普遍认识。也就是说,在《水浒传》早期流传过程中,明人往往将《水浒传》当作“野史”“传记”“子杂”“杂传”之一种,认为可比肩史书,而不以为是通俗小说,或纯粹的“悦部”作品。

## 三 “忠义”与《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官方意志

那么,上述对《水浒传》的接受过程与传播结论是否仅仅是民间的意见?这种意见是否因曾获得统治者的认可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

从明季的文治背景看,明初朱元璋大兴“党狱”与“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与言论控制。《大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12]至宣德、正统时,文化专制与思想禁锢相对松懈,社会思想开始活跃,杂剧、戏曲等说唱文学与“稗官小说”渐自复兴。尤其是明中叶以降书籍刊刻已由明前期的官府控制演变至士大夫私人刻书并进一步出现诸多书坊主刻印贩卖牟利的情形,客观上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13]这时期的通俗文学刊刻,最早扬自于朝廷,亦系官府主导。弘治五年壬子(1492)五月,内阁大学士邱濬(1420?—1495)在《请访求遗书奏》(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46题为《隆重图书疏》)中提出:“臣请敕内阁将考校见有书籍备细开具目录,付礼部抄誊,分送两直隶、十三布政司,提督学校宪臣,榜示该管地方官吏军民之家,与凡官府学校寺观并书坊书铺,收藏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系内阁开去目录无有者,及虽有而不全者,许一月以里送官。其有王府处启知借录,多方差人询访,设法搜采,期于尽获无遗。行仰所在有司将各处赃罚纸札,并给官钱措办笔墨之费,分散各处儒学生员誊写,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许潦草失真。就令各学教官校对既毕,以原本归主,不许损坏不还。其所得书目先行开具,陆续进呈,通行各处,互相质对,中间有重复者止令一处抄录,录毕装成卷帙,具本差人类解赴京。”[14]也就是说,当时朝廷征集书籍刊刻,从民间“询访”收集,开始将“稗官小说”纳为遴选对象。“令各学教官校对”,就含有一定程度政治审查的意味。而现存《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刻本为嘉靖元年壬午修髯子(张尚德)《引》刊本,通称嘉靖本。王重民[15]、胡士莹[16]等认为此本或即朝廷司礼监刊本。魏安则指出王、胡所论不确,认为:“从版式(黑口、四边双栏)和字体来看,似为嘉靖间官刻本,然而不能仅仅凭着有嘉靖元年的修髯子引鉴定为嘉靖元年的刻本。因为别的版本也有这篇修髯子引(如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皆有),而它们都不出于嘉靖本,我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们可以肯定嘉靖本非嘉靖元年修髯子引的原本而是后来的子孙本。嘉靖本的存本很多，恐怕不一定都是嘉靖间的原刊本，而其中一部分的藏本可能是晚明的翻印本。”[17]12-13魏安认为上海图书馆藏残叶本方为司礼监本，证据是：刘若愚《酌中志》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为 24本，1150叶，但嘉靖本有 1923叶，而“如果用嘉靖本的字数来算上海残叶的版本原来应该是多少叶（以 528字位为一叶），该本正巧应该有 1150叶。”[17]92-93然而不管如何，皆可说明司礼监曾刊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至于今存哪一版本属司礼监本，则可进一步商榷。）若上述推论合理的话，则《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版本或由朝廷向民间征集而来或由民间进献，后由统治者主持刊刻，至少与朝廷存有莫大关联。[18]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载：“续文献通考》以《琵琶记》《水浒传》列之《经籍志》中，虽稗官小说，古人不废。然罗列不伦，何以垂后？近则钱遵王《书目》亦有《水许传》。明时《文华殿书目》亦有《三国志通俗演义》。”[19]作为官方书目的《文华殿书目》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至少可说明《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与流传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可，才得以收藏于文华殿之中。——文华殿始建于明初，系明朝帝王常御之便殿，每当“经筵”日，当朝帝王多至文华殿听大学士、翰林侍读等为其讲解“经传史鉴”。嘉靖十五年（1536）仍改为皇帝便殿，后为明代“经筵”之所，清代沿袭明制。《三国志通俗演义》或是当时“侍讲”人员进行“史鉴”素材提炼的参考书籍之一。故当时的统治阶层是认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综此，明代《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

从《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古今书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等明季书目著录《水浒传》亦同时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情形看，既然《三国志通俗演义》亦被当作“野史”或“杂传”类，“世人视若官书”[20]，与明人对《水浒传》的基本认识本质无异，那么《水浒传》的流传过程，或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有些相似。首先，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八“高俅”条言：“罗贯中《水浒传》，《文渊书目》中有之”，清晰可见明时文渊阁对此书的收录。同时，《古今书刻》明言都察院曾主持刊刻有《水浒传》，又有武定侯郭勋家刻《水浒传》的记载。今虽不能确认都察院刊本是否是《水浒传》的最早刻本，但都察院主持抑或是武定侯家刻，至少可说明《水浒传》的刊刻是由当时社会上层开始的。这种刊刻与其时朝廷向民间征集“稗官小说”当有莫大关系。其次，现存最早一批谈论《水浒传》的资料，如李开先《词谑》、钱希言《戏瑕》、熊过《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等，①所涉及的谈论者如李开先、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文征明等，无不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水浒传》早期传播或从这些文人手中流传开来。佐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传播情形，则《水浒传》早期流传亦当由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21]

上述所言不差的话，当时朝廷刊刻前或对《水浒传》进行过一番审查。也就是说，在《水浒传》由上至下传播过程中，其传播伊始就应符合当时的官方意志。《明实录》曾载：“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买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顾炎武《日知录之馀》卷四“禁小说”条）[22]15据此，当时“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邪说异端”被认为是“惑乱人心”的，因此朝廷不允许此类小说戏曲于市面流传；尤其是，“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买及藏习者，问罪如律”，更是表明当时官府欲从源头予以杜绝的决心。既然“遇此等书籍”都要焚毁，就更不可能出现官府主持刊刻此等书籍的情形。何况都察院职为“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下耳目风纪之司”（《明史·职官志一》）[23]，系检察、监察机构。而当时都察院主持刊刻《水浒传》，表明当时朝廷刊刻前已对《水浒传》经过一番审查，最终是认可的。可资佐证的是，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二十三日郎中龚彝曾上褶崇祯皇帝，言：“兵部为梁山寇虽成擒等事该本部题前事等因，崇祯十五年六月日本（部）尚书陈等具题，十五日奉圣旨：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钦此。钦遵钞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督察院，合咨贵院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转行山东巡按，即严饬道府有司，实心清核，务令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尽速令尽行烧毁，

① 王齐洲《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 3 期，第 183—190页。王齐洲、王丽娟《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 4 期，第 56—62页。王丽娟、王齐洲《〈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 5 期，第 44—52页。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并通行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禁毁施行。"[2]18崇祯时期查禁《水浒传》时首先勒令都察院进行自我清查、并督"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查办,其目的是规避《水浒传》对民众的不良影响。这本为都察院的职责所在,然此举反过来表明先前都察院刊刻《水浒传》时是认可《水浒传》的,代表了崇祯十五年之前明代朝廷的官方意志。也就是说,都察院不论是刊刻《水浒传》还是查禁《水浒传》,仅是明代不同时期为维护政权而采取的不同措施罢了,刊刻与查禁都是当时官方意志的集中反应。

随之而来的是,崇祯十五年之前的明代朝廷为何会认可《水浒传》?现存《水浒传》最早刊本题为《京本忠义传》,在早期的版刻系统中题署多含"忠义"二字,这应该引起论者重视,成为一种探讨的切入点——即当时朝廷刊刻之由或因《水浒传》"忠义"思想而放行的。

众所周知,自《晋书》设"忠义传"起,《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辽史》《元史》等历代正史皆承其绪。有论者指出"忠义"内涵在历代正史"忠义传"中有一个变化过程,《新唐书》以前的正史"忠义传""既收录为维护朝廷利益而置生死于度外的文臣武将,也收录百般照料他人的绅民";《新唐书》以后的正史"忠义传"所收,"虽然主要仍为舍身报国的文武官员,但对百般照料他人的'义举'不再记述,反而增加了为国殉亡的平民","忠"主要是"针对封建政府、封建帝王而言的"。[4]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暂且不论"忠义"的内涵、演变及其历史意义,单就明人所修《元史》"忠义传"入选标准、列选对象及其事迹与《水浒传》所言"忠义"的异同,作一番勾勒。

《元史》系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修撰,以宋濂等为总裁,两开史局,历331天仓促而成。《元史》"忠义传"凡4卷(即卷一百九十三至卷一百九十六卷),立传者55人,附传者30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元史》"忠义传"所修曾据张翥《忠义录》为蓝本。王慎荣进一步指出《元史》"忠义传"第2、3卷以《忠义录》为蓝本,第1、4卷另有所取。[5]张翥本传曾说:"集兵兴以来死节死事之人为书,曰《忠义录》。"则《忠义录》遴选标准"死节死事之人",即撑持元朝统治而效命捐躯的人,当亦被吸纳自《元史》"忠义传"中。今《元史》"忠义传"所立传者,既有下层官吏,如死不降金的"平阳元帅府事"李伯温;又有农民起义军,如"以读书力田为业"后被迫"聚兵"抗金的石珪;又有平民百姓者,如"世农家"而"出保高富庶寨"的攸哈剌拔都等等,类似情况见《元史》"忠义传"全部4卷之中。所立传者大多系忠于朝廷、宁死不折节之类,如被盗贼所抓瞠目不屈的"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张恒,曾受"山东宣慰使"而宁死不降的普颜不花。[6]这成为《元史》"忠义传"立传的标准,它并不因被立者身份地位、阶级出身、贤才与否而有别,而以是否忠国、有气节并为国家舍身奋斗为取舍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这种思想代表了明代官方对"忠义"的界定与诠释。

《水浒传》所写"忠义"思想,与明代官方对"忠义"的界定与诠释是相符合的。

首先,从《水浒传》的人物设置看,"忠义"成为作品刻画人物的重点。《水浒传》所写一百单八将,众好汉的身份与出身极其复杂,既有市井流氓、手工业者,又有朝廷文臣武将,乃至下层官吏,还有道士、下层文人、地主、富商等,不一而足。他们落草梁山泊的原因虽各异,但最后皆在"忠义堂"下结拜,以"替天行道"为指导;接受了朝廷"招安",乃至出征平辽,实是"全忠仗义为臣"。故第八十一回卷首"入回诗"说:"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受帝封。二十四阵破辽国,大小诸将皆成功。"所谓"替天行道存忠义"表明作品是以"忠义"为"替天行道"的主要内涵,"受帝封"表明作品人物"忠义"思想的效忠对象是当时的皇帝,"破辽国"就是众好汉忠君爱国的具体事例。并且,在这一百单八将中,有不少人物是以《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小录》等文献所载"忠义军"为原型的。据王利器《〈水浒传〉与忠义军》考证,王英、张横、史进、杨志、董平等始见于《水浒传》中的人物,"人是忠义军的人,事是忠义军的事",[7]可知《水浒传》所写吸纳了当时正史、杂史的不少材料,故《水浒传》所写确有所本,所言亦多有合乎其时官府言论者。

其次,从《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看,"忠义"成为作品着笔最多的部分。当"梁山泊大聚义"时,天文石碣铭文为:"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众好汉在"忠义堂"前立硃红碑并书金字:"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并誓言"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梁山泊大聚义"之后,他们所作的事是"辅国安民",并含有"去邪归正"之举,镇压方腊起义就是显例。因此,《水浒传》肯定一百单八将之"义"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对朝廷之"忠"。不论是从统治者维护统治、控制思想的政权设计看,还是从统治者进行舆论先导、表彰典范的现实需求看,《水浒传》所写本质上并未与《元史》"忠义传"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相背离。恰巧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含有很大程度的“忠义”思想。《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主要思想皆含有忠君与爱国两方面，[①]这与当时的统治思想保持一致，使得《水浒传》在流传初期就能像《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阻碍较少。只不过《水浒传》“忠义”思想所含忠“君”成分较多，宋江就曾说过“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之类的话。

在明朝统治者看来，如若能通过刊刻《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宣传“忠义”思想，为普通民众提供一系列可资学习、借鉴的“忠义”人物，进一步笼聚民间思想使其朝着有利于维护政权统治的方向发展，何乐不为？可资佐证的是：清乾隆时因“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朝臣制“诸院本进程，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中就有“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谓之《忠义璇图》”[28]，知清代以《忠义璇图》宣扬“梁山诸盗”于国有忠心，尔后才令“水浒”戏曲于“升平”时搬演。也就是说，明中叶以降至乾隆初年，官府皆从“忠义”角度肯定“水浒”小说与戏曲，并许其于社会流传的。正因如此，明中后期的书商看到了当时朝廷推崇《水浒传》之由，在“忠义”上大作文章。如大涤馀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明末芥子园刊本）曾说：“尔知《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所杀奸贪淫秽，皆不忠不义者也。道揆法守，讵不相因哉！”[5]200指出明代《水浒传》得以流传在于作品书写“以招安为心”与“忠义”，有“道揆法守”之用，从而与当时朝廷对《水浒传》的定位保持一致，因此刊刻《水浒传》就不会受到当时朝廷的阻扰与清查，有利于销售谋利。也就是说，明代中后期的书商进行《水浒传》刊刻时题署冠以“忠义”二字，实是体察到当时统治者对待《水浒传》的态度，有意迎合之。进一步而言，明中叶以降的《水浒传》刊本中（尤其是诸书坊所刊的），书名多含“忠义”二字，因由亦在此。

若此，论者以为《水浒传》“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现象，就能得到合理解释——《水浒传》由当时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流传，在刊刻前已由朝廷进行严格政审，当不大可能存在诸多反对声音的描写。——“三度招安受帝封”“同著功勋于国”之类的说明，即是明证。明朝统治者从“忠义”思想出发刊刻《水浒传》，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以维护统治，这应该是《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使《水浒传》得以寻求一件可靠的立身外衣。从《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由当时官方主导、传播过程是从当时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流传等情形看，明中叶以降白话章回小说的起与兴，并非是单纯的民间行为，其所反映的亦非简单的民间意识。彼时白话章回小说起与兴的早期，或得益于当时朝廷的揶扬；某种程度上讲，这可以看作是当时朝廷对下层社会进行思想控制、娱乐导向的结果。若此推论可以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对明代章回小说的产生过程与思想价值，都需重新讨论。当然，上述“理证”还需要更多的文献予以细化。此处权作抛砖，期盼能有更多同仁同好参与讨论，以明所以。

## [参　考　文　献]


[1] 温庆新.晁瑮《宝文堂书目》的编纂特点——兼论明代私家书目视域下的小说观[J].孝感学院学报，2011(5)：35-39.
[2]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4]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5] 温庆新.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方法论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45-53.
[6] 王圻.稗史汇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3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532.
[7]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5430.
[8] 王丽娟.《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54-59.
[9] 钱希言.戏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13.
[10] 袁宏道.觞政[M].北京：中华书局，1991：4.
[11]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18.
[12] 御制大明律[M].明洪武三十年五月刊本，1397.
[13]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34-339.
[14] 邱濬.重编琼台稿[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861.
[15]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01.
[16] 胡士莹遗著，曾华强整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J].明清小说论丛：第4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156.
[17]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8] 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0-13.
[19] 阮葵生.茶余客话[M].苏州：扫叶山房民国十三年影印，1924.
[2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
[21] 赵敬鹏.论《水浒传》“朴刀”的失传——基于文学与图像关系视角[J].中国文学研究，2014(3)：44-48.
[22]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3] 张庭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68.
[24] 秦翠红.中国古代“忠义”内涵及其演变探析[J].孔子研究，2010(5)：60-62.
[25] 王慎荣.《元史》列传史源之探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2)：1-7.
[26]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4377-4437.
[27] 王利器：《水浒传》与忠义军[M]//耐雪堂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19-234.
[28] 昭槤.啸亭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377-378.


① 案，有关《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忠义”思想及其异同比较，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不赘。可参看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　　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王东明《建国以来〈三国演义〉主题研究综述》，《理论月刊》1995年第3期。段启明《〈水浒三序〉与忠义之辨——重读李贽〈忠义水浒传序〉》，《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程毅中《〈忠义传〉与〈水浒传〉》，《文史知识》2003年第10期。曹亦冰《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两书之魂——忠义思想看罗贯中着意塑造的英雄人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年10期等文。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